

浅论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及其在护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李 天 松

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了拯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高举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和复辟帝制的大旗,于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该党建立后,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这一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所以孙中山称它是第三次革命。本文试就中华革命党在护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作一些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一)

二次革命后的形势,迫使孙中山再度亡命日本。当时,国民党在南方各省的军事、政治力量受到袁世凯的严重摧残。国民党的一部分激进分子先后为袁世凯屠杀,一些不坚定分子在封建势力的威逼利诱下,堕落为袁世凯的心腹爪牙;其他国民党员都先后逃亡日本、南洋等地。这些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大多灰心丧气,“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谮。”“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几乎一蹶不振。”^①但孙中山却毫不气馁,“自东渡以来,夙夜以国事为念”,继续为挽救革命失败而英勇奋斗。他谆谆教导革命党人,“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只要坚持斗争,“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②表现了他再接再厉、斗争到底的伟大革命家的气魄。这时,他认真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认为这次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党员不服从领袖命令,革命组织涣散无力所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完全抛弃了同盟会的纲领,只“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党内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③国民党失去了同盟会时期的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进取精神。宋教仁被刺身亡后,国民党很快又分裂为“政友会”、“相友会”、“癸丑同志会”、“集益社”、“超然社”等五花八门的小团体。它们“皆独断独行,各行其是,无复统一。”^④鉴此,孙中山在致黄兴的信中感慨地说:这次革命“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⑤因此,孙中山决定从整顿党的组织入手,“恢复民国以前革命党人之面目,而加以严格之训练”,^⑥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当时规定凡要求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人都必须填写誓约,盖指模,郑重宣誓“附从孙中山再举革命。”^⑦但孙中山的这一决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首先，是原国民党的一大批上层人物对这一决定表示反对。黄兴对这一决定尤持异议。他认为袁世凯在用武力打败国民党之后，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而国民党已赤手空拳，如果现在去和袁世凯硬拚，无疑是以卵击石。他主张“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扬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目前应趁亡命之机，研究学问，“组织干部，计划久远”，只有这样，才能使“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⑧黄兴的这种主张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意向。由于他们这些人反对改组国民党，使一些动摇不定的国民党人离开了孙中山，削弱了改组国民党的群众基础。

其次，是中华革命党的入党手续问题上也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国民党人的不满，特别反对《中华革命党誓约》上的“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和盖指模的规定。他们认为“革命系服从主义，不应服从个人；孙先生系属个人，对个人服从有违共和民主。”^⑨盖指模系命犯人所为，^⑩因此，他们以平等自由为借口，反对服从命令，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没有因部分革命党人反对改组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他指出：党员服从领袖，不是服从个人，而是服从他们的团体。他严厉批评某些国民党人说：“殊不知革命主张平等自由，为最大多数国民谋之，非为革命党自身谋之。若为自身谋平等自由，则革命党不应有团体之组织。以既有团体之组织，则应有团体之纪律。”^⑪“吾党固主张平等自由，然党人讲平等自由，都把平等自由安错位置，不把平等自由安给国民，而把平等自由安在自己身上。自己要平等，而不服从创造主义之人，偏要人来服从他。自己要自由，而不肯牺牲，偏要人来供他的牺牲。所以自第一次革命以来，吾党之受人攻击，以至失败者，大半都是将平等自由弄错了，设欲举第三次革命，以求真正成功，非把以前错处都改了，则无成功之希望。”^⑫由于孙中山对国民党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认识了平等自由的真实意义，使一部分国民党人明确了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同时，由于孙中山对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反对改组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分清了是非，更使一部分国民党人认识到改组国民党是继续进行革命的当务之急。因此，逐渐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核心力量，终于在1914年7月8日建立了中华革命党，接着公布了《中华革命党总章》，明确宣布了“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的革命纲领。^⑬要求每个党员立约宣誓：“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⑭这样在组织上屏斥了官僚，淘汰了伪革命党，克服了国民党期间组织涣散，独断独行的弊端，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为中华革命党发动护国运动，推翻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

中华革命党建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对袁世凯的卖国独裁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首先，在舆论宣传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孙中山在筹建中华革命党期间，就在东京创办了《民国》杂志，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后，《民国》杂志成为该党机关刊物，以“研究民国政治革新之重大问题”为主旨^⑮。宣传党的纲领政策，揭露袁世凯独裁专制、媚外卖国，鼓吹三次革命，激励革命党和人民群众进行反袁斗争。在孙中山的教育和带动下，中华革命党人在国内外陆续创办了一些报刊杂志，并以此为阵地，积极开展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革命工作，把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的各项主张变为人民群众讨伐袁世凯的决心和力量。在上海，革命党人先后创办了《五七报》、《天中报》、《民国日报》等。《五七报》创刊后，对袁世

凯的卖国罪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使袁世凯惊恐万状，先下令禁止人民群众阅看，后又下令封闭。革命党人毫无畏惧，立即改名《天中报》继续出版。上海《民国日报》创办后，每天发表一篇社论，论述打倒袁世凯和建设完全民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讨袁的具体方针和步骤，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反袁的信心和决心。

在美洲、香港、南洋等地，中华革命党也创办了很多宣传刊物。在美洲各地的日报和隔日报有《民国报》、《大同报》、《民气报》、《少年中国晨报》、《自由新报》、《醒华报》、《新民国报》等，杂志有《民国》周刊一种^⑧。《民国》周刊为全美之唯一杂志，“排击袁世凯独裁及发挥三次革命最力。”^⑨《新民国报》在华侨中也起了重要宣传作用。该报原为加拿大同盟会机关报，1914年冬，由胡汉贤负责在域多利城《新民国报》中建立了中华革命党加拿大支部，该报也就成了它的机关报^⑩。当时，在加拿大华侨中有一民间秘密团体叫“致公堂”，辛亥武昌起义前曾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因孙中山没有满足致公堂首领黄三德当南京临时政府总长的要求，就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成立后，黄又指使致公堂的《大汉日报》，号召华侨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诋毁中华革命党在加拿大的革命活动。《新民国报》于是撰文，用具体事实揭露袁世凯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复辟帝制的阴谋，号召广大华侨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为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再造共和作出贡献。由于该报的深入宣传，使广大华侨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中华革命党在华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同时，由于致公堂的上层人物已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原保皇党人沆瀣一气，反对中华革命党，也引起了一部分下层成员的不满，纷纷退出致公堂，加入中华革命党。这样使加拿大先后成立中华革命党分部和通讯处达五十余处，党员发展到数千人^⑪。

在香港，中华革命党创办了《现象报》、《香江晨报》、《大光报》等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党人控制的香港《商报》和澳门的《澳门时报》进行了论战，扩大了中华革命党的影响，对推动港澳同胞参加反袁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在南洋等地中华革命党创办了《国民日报》、《民国报》、《光华日报》、《华暹新报》、《觉民日报》等^⑫。这些报纸主要是宣传组织中华革命党的重要意义，号召南洋各地华侨积极投入反袁斗争。这样使南洋各地的原国民党支部，如新加坡、越南河内与堤岸、印度加尔各答、泰国曼谷等支部都先后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⑬。

中华革命党通过大量的舆论宣传工作，一方面揭露了袁世凯倒行逆施、帝制自为、危害民国的丑恶罪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恨，促使不少人投入了反袁的武装斗争；另一方面深入宣传了中华革命党的纲领政策，击退了以康梁为首的原立宪党人的进攻，争取和团结了海内外一部分人民群众，扩大了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坚定了革命党人反袁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为发动护国运动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中华革命党在进行舆论宣传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开展武装倒袁的军事斗争。孙中山在筹建中华革命党时，已进一步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把武装倒袁放在党的一切工作之上。他曾明确指出：“国事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即是武力。”^⑭“以积极的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⑮所以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即在东京创办了军事学校“浩然庐”和“法政学校”^⑯，“以期培养人才，充实干部”，参加学习的大部分是流亡党人的子弟，共二百余人。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全体宣誓加盟。毕业后，都被中华革命党秘密派遣回国，组织和领导讨袁的军事工作。与此同时，孙中山还派遣了大批干部回国，秘密组织军队，举行武装起义。1914年5月，孙中山命邓仲元至香港，成立了反袁军事指挥所。6月，广东的中华革命党人在邓仲元的领导下，在黄冈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接

着在德惠又发动了第二次起义，同袁世凯的爪牙——广东军阀龙济光进行了激战。起义军虽然失败，但它是中华革命党人在国内的首次反袁武装起义，点燃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烈火^{②5}。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反袁武装起义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1915年夏，当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后，孙中山看出，袁必称帝，“从此中华民国名义亦将归消灭，内地不平之声甚烈，……此较满清末年轻铁道国有风潮尤易激动全国，洵为无党不可失之时机。”^{②6}所以同年6月，孙致函菲律宾华侨，促其筹款讨袁，说“今日根本救国，舍倒去恶劣政府，更无他术。”^{②7}为此，孙中山召集中华革命党各部长举行了重要军事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军，在上海、青岛、广州、三原(陕西)筹设军部。孙中山以中华革命军大元帅的名义，任命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为四军总司令，并任命了各省的司令长官，以负责每一省区的讨袁工作^{②8}。10月，孙中山又命陈其美至上海、居正赴山东、朱执信往广东、于右任返陕西、石青阳至四川，从事起兵讨袁。这样，“各地的中华革命军，风起云涌，成为颠覆帝制运动之中心势力。”^{②9}

陈其美至上海后，虽决定立即起义，但袁世凯对上海控制很严，派他的心腹爪牙郑汝成镇守上海，拥有反动武装10余万人，这对中华革命党人在上海发动起义是最大的障碍。于是陈其美等人决定先除掉郑汝成，然后起义。革命党人王晓峰、王铭山自告奋勇地接受刺杀郑汝成的任务。1915年11月8日，他们趁郑汝成前往日本领事馆参加日皇登基典礼之机，终于炸死了郑汝成。接着发动了有名的肇和军舰起义。只因起事仓卒，陆上进攻电话局、警察局等路起义军未能取胜，夺取应瑞、通济两军舰计划亦未成功，起义最终失败。但这次起义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打击了独夫民贼袁世凯的凶焰，振奋了全国人民反袁的勇气。正如陈其美、居正就“肇和之役”通告全党所说的那样，这次起义“为第三次革命海陆军突起之一大霹雳，又为各地讨袁军最有力之导火线。”^{③0}这次起义后不久，讨袁的护国战争便在云南爆发了，这与“肇和之役”有着直接的关系。朱执信在《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一文中说：“厥后云南继起，遂克有成，然推其本原，不得遂桃去肇和，正犹武昌起事之前有三月廿九之役也。中华革命军实先护国军而起，而以甚大之好影响与护国军者也。”^{③1}这种评价是令人信服的。

(三)

中华革命党组织的“肇和之役”，不仅对云南护国军起义的爆发有直接的影响，而且这次护国军起义也是在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直接推动下开始的。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除任命云南军官邓泰中主持滇省中华革命军讨袁军事外，并派吕志伊回滇负责运动军队起义^{③2}。陈其美回上海后，又派党人扬大铸到云南积极进行倒袁活动。他们在滇军中先后吸收了董鸿勋、杨秦、李文汉等许多中下级军官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在昆明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成为云南发动护国军起义的核心力量。吕志伊等人经过多方联络后，召集滇军中团以上军官举行了秘密会议，议决了讨袁办法四条：“一唐继尧如反对帝制，仍推为领袖；二唐继尧如表示中立，以礼送之出境；三唐继尧如附和帝制，则杀之；四如唐继尧采取二、三两项，则拥罗佩金为领袖。”^{③3}唐继尧在云南军队中下级军官的强大压力下逐渐转变态度，同意讨袁，并于1915年10月上书孙中山，期望孙中山“登高一呼，俾群山之皆应”，“一切机宜，祁予随时指示，得有遵循，总期早除袁氏之大慝，复我民族之自由，马首是瞻，共存义举。”^{③4}拥护孙中山领导全国反袁斗争。接着吕志伊等人与唐继尧

举行了三次秘密会议，讨论了罗佩金拟定的讨袁作战方案，进行了战略部署，并定于袁世凯登极之日，宣布起义。12月17日，李烈钧、熊克武受孙中山的委托来到了云南，进一步加紧了云南起义的准备。^⑤至此，武装倒袁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即使后来蔡锷不回云南，护国战争也必然爆发。蔡锷于12月19日回到昆明，团结各派力量，组成了护国军，并表示愿意“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⑥誓死“为四万万人争人格”，^⑦与卖国贼袁世凯斗争到底，这对滇军反袁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加速了护国战争的爆发，也应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正如上面所述，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对推动护国战争的爆发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再从云南护国军来说，三军的军长，除第一军军长蔡锷是进步党人外，第二军军长李烈钧是发动反袁“二次革命”的国民党重要军事首领，第三军军长唐继尧虽曾拥护袁世凯，但到护国军起义前夕已转变拥护孙中山。三军的各级将领，绝大多数均为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或中华革命党人。他们大都拥护孙中山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他们之所以参加护国军起义，是响应孙中山的号召，为民主共和而战。所以没有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高举捍卫民主共和、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旗帜，以及在各省发动广泛的反袁斗争，护国战争首先在云南爆发是困难的，即使爆发，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护国战争爆发后，孙中山立即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发动了《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的无耻行径，坚决表示要“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呼吁一切“爱国之豪杰共图之。”^⑧同时指示中华革命党人“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闽、粤一下，与云贵打成一片”。^⑨首先命令朱执信在广东发动起义。朱执信到广东后，便以中华革命党广东司令长官的名义，委任陆荣廷、邓子瑜、李海云分任广肇区、惠潮梅区、高雷区司令，一面运动袁世凯的心腹爪牙龙济光统率的济军，使其军心动摇；一面发动武装起义，先后在石湖、黄麻涌、紫洞、香山、乐从、佛山、石湾、江门、新宁、高州、雷州、北江、石龙等地，与龙济光的济军进行了数十次激烈战斗，中华革命军在广东迅速发展在一万七千多人，^⑩牵制住了龙济光的五万济军，动摇了袁世凯在广东的反动统治。当袁世凯要龙济光派兵镇压云南护国军起义时，只能勉强抽调三千反动武装前往，不能造成对护国军的严重威胁。以后革命党人又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迫使龙济光不得不宣布“独立”，为护国军假道广东，进兵江西，实行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护国军进入四川后，孙中山又任命卢师谔为四川中华革命军总司令，在成都附近发动武装起义，并组织了一支近700余人的“四川护国军”，与四川将军陈宦派来的北洋军黄树成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黄树成部几乎全军覆灭。四川护国军的胜利，迅速影响到川西、川南和川北，迫使陈宦不得不宣布讨袁“独立”，为云南护国军在四川的战争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中华革命党发动的武装起义，对袁世凯统治打击最狠的是山东起义。护国军起义后，孙中山又命居正为东北军总司令，许崇智为总参谋长，到青岛设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发动讨袁战争。他们到青岛后，迅速编练了东北军两个纵队和五个支队，许崇智兼任前敌总指挥，决定于1916年2月9日至10日发动起义。但到2月6日，吴大洲、薄子明率领的第四支队攻占了周村，并改第四支队为山东护国军，沿胶济铁路向前推进，迫近济南。接着其他几个支队也提前发动了起义，先后攻占了昌乐、高密、益都、安丘、昌邑、寿光等地。五月间，东北军又击溃了敌军张树元率领的第五师，俘虏官兵七千余人，克复了潍县县城。^⑪东北军克复潍县后，孙中山又组织了500多人的“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由夏重民率领开赴潍县，巩固革命阵地。^⑫同时，孙中山还把华侨捐献的三架飞机组成了一支飞行队，由胡汉贤率领，也一同派往潍县。东北军这时发展到三万多人，又有大炮和飞

机，军威大振。^{④③}居正、许崇智又立即根据孙中山的“占济南则东北全局可迎刃而解”的指示，^{④④}积极部署力量，发动了两次对济南城的进攻，后来由于日本的阴谋破坏，均未攻下。但东北军在山东的武装起义，使袁世凯在山东的反动统治受到严重打击，山东将军靳云鹏胆颤心惊，向袁世凯提出坚决辞职。袁世凯更是坐卧不安，为巩固他在北方的老巢，不敢抽调他直接统率的大批北洋军南下镇压云南护国军，这就极大地减轻了云南护国军在军事上的压力，保护了护国战争的胜利发展。

在东北军发动山东起义后，陕西的中华革命党人郭坚、耿直也立即通电讨袁逐陆（袁世凯的爪牙，陕西将军陆建章），发动了白水起义，打败了陆建章的反动武装，迫使他逃往陕北。“中华革命党的势力，遂东至黄河、西抵陇县，北达三原以上。”^{④⑤}1916年5月，孙中山又命胡景翼回陕西高平发动起义，歼灭了陆建章之子陆承武率领的“中坚团”，陆承武本人也被俘，^{④⑥}陆建章仓皇逃走，中华革命党人宣布陕西独立，使袁世凯在陕西的反动统治瓦解。湖北的中华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号召下，于1916年初发动了武昌南湖炮队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很快失败，但也有力地打击了袁世凯在湖北的反动统治势力。自此以后，“鄂兵只自保治安，不复为袁敌滇。”^{④⑦}同年，湖南的中华革命军总司令林德轩，总参谋长林修梅，在长沙组织了三次“泼汤大会”。^{④⑧}在湘西大庸、永顺、吉首等地举行了武装暴动，歼灭了北洋军第五师。中华革命党在湖南的势力得到迅速发展，袁世凯在湖南的心腹爪牙，湖南将军汤芗铭最后狼狈逃出湖南。浙江的中华革命党人也运动军警，迫使浙江将军朱瑞独立，朱瑞逃走后，于1916年4月12日宣布浙江讨袁独立。^{④⑨}江苏党人在“肇和之役”失败后，仍然继续进行反袁斗争。1916年4月发动了攻占江阴炮台之役，占领了吴江等地，^{⑤①}后虽失败，但使袁世凯在上海的数师兵力，不敢调动一兵一卒前往云南镇压护国军起义。此外，福建、安徽，江西等省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先后发动了武装暴动，宣布反袁独立，使袁世凯在这些省份的反动势力受到了很大冲击。

正是由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和暴动，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气焰，牵制了他的兵力，动摇了他的专制独裁统治的基础，才使得护国战争“有进无退”，^{⑤②}取得节节胜利。也正是由于中华革命军在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和云南护国战争的不断胜利，才迫使袁世凯在1916年3月22日下令撤销帝制。

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后，仍想保住民国大总统的职位，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名义，分电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刘显世、梁启超等，说什么“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取干戈，共图善后”，企图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欺骗人民。孙中山识破了他的阴谋诡计，立即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并向全国人民宣布：“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使谋害民国者复生于国内。”^{⑤③}表明他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不仅要把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坚决进行到底，而且要铲除一切“谋害民国者”，这就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反对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统治的信心和决心，使袁世凯的阴谋诡计彻底破产。袁世凯终于在举国人民一致反对下，1916年6月6日忧愤死去，护国运动宣告结束。

（四）

在护国运动中，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始终站在反袁斗争的最前列。孙中山是护国运动的旗手和精神领袖，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是护国运动中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但云南护

国战争爆发后，反袁斗争的领导权，却很快被善于投机取巧、随风应变的进步党所窃取。中华革命党只落得一个配角的地位。黎元洪继袁世凯任总统后，在段祺瑞内阁里竟没有一个中华革命党的席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其根本原因，仍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及其在纲领政策上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

首先，在政治纲领上，中华革命党只提出民权、民生两个主义，没有提出反帝内容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看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民族革命已经完成。他没有认识到不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就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当时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特别是期望日本赞助他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斗争。他曾致函日本内阁首相大隈重信，希望日本改变支持袁世凯的政策，支援中国革命，“以救东亚危局”。他甚至认为“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⑤。这就不可能使中华革命党提出明确地反帝的民族主义纲领。同时，中华革命党提出的“民生主义”也是空洞无物，连“平均地权”的字样也一笔勾销了。但军阀幕后的支持者是帝国主义，而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又是中外反动势力的社会支柱，反帝和土地问题未提出，相对于同盟会的纲领来说是倒退了。因此，中华革命党的政治纲领没有多大号召力，不能动员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聚集在中华革命党的旗帜下，共同进行反袁斗争，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在组织上，中华革命党沿袭了中国封建的结盟方式，而组织原则是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规定党员“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⑥发展党员除有介绍人外，要入党者填写《誓约》，加盖中指模以示忠诚。如果党员叛变，要受到严厉惩处，并追究介绍人的责任。为了强调统一，孙中山任中华革命党总理，以下各部的正副部长，各地支部长都由孙中山直接委任，引起了一些国民党元老的反感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中华革命党在党章中还规定党员按参加时间先后，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种党员，在政治上各有不同的待遇。这样做的结果既把许多不同意中华革命党意见的革命党人排斥于门外，又加深了党内党外的隔阂，进一步脱离了群众。事实上，利用个人利益来吸收党员，不仅不能建立一个朝气蓬勃的、有战斗力的、统一的革命政党，而且只能使党更加孤立。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国民党内部就明显地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东南派和以黄兴为首的南洋派。黄兴赴美后，东京的南洋派另组“欧事研究会”，使一大批革命党人离开了孙中山。因此，在护国运动中，中华革命党不可能真正形成全国反袁的核心力量，牢牢掌握反袁的领导权，以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袁斗争。

第三，军事上，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虽坚持了武装反袁的革命道路，指挥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这是在全国人民进行声势浩大的反袁斗争，严重地动摇了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基础，为中华革命党的武装反袁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情况下取得的。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运动中，几乎全部重犯辛亥革命以来的军事错误。他们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是反袁斗争的主力军，也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如果不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必将一事无成。相反，他们轻视人民群众的斗争，不愿到人民群众中去进行艰苦细致的发动和组织工作，更不愿站出来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袁斗争。他们仍然是联络旧军队，招募退伍军人，用金钱收买“土匪”。在各地组织小规模武装暴动或暗杀活动，从表面上看，确是此起彼伏、遍及全国，但实际上还是单纯的军事冒险，不可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尽管许多中华革命党人在斗争中英勇顽强，艰苦奋战，但由于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最后总免不了失败，不可能掌握反袁护国战争的军事领导权，其结果只能是一场悲剧。

综上所述,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发动的这场护国运动,最后虽然没有达到“建设完全民国的目的”而失败了,但他们为了维护辛亥革命在中国开创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与帝国主义支持的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进行了浴血奋战,最终与全国人民一道,粉碎了袁世凯的帝制复辟,进一步动摇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他们那种爱国献身精神,也是值得称颂的。

注释:

- ①③④⑬②⑦②⑤④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12、92、82、97、170、176、284—285、92页。
- ② 尚明轩:《孙中山传》,第87页。
- ⑦⑪⑫⑬②⑤③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59、273、273、160、161、286页。
- ⑤③③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第1084、1058页。
- ⑨⑩⑬⑬③③④⑦⑤① 《革命文献》,第五辑,第总649、总649、总633、总633、总644—645、总646、总646页。
- ⑥① 许锡庆:《中国之革命理论与史实》,第356页。
- ⑧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53页。
- ⑮ 《民国杂志》,第一卷,第二号。
- ⑬④⑨ 《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5—27页。
- ②⑨ 《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二十编,民初政治(二),第277页。
- ②⑤ 《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 ②② 邓泽如:《孙中山二十年来手札》,第三卷。
- ②④②②④④⑤⑤⑤⑤ 《开国战史》(三)武大历史系藏,第462、465、467、485、487、488、487页。
- ③⑤⑤ 何仲箫:《陈英士先生年谱》,第67、67—68页。
- ⑤②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略》,第78页。
- ③④ 董雨苍:《云南护国历史资料》,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 ⑤⑤ 《革命文献》,第六辑,第总805页。
- ③⑥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132页。
- ③⑦ 梁启超:《护国运动回忆录》,载《梁任公先生学术讲演集》,第三集。
- ③⑧③⑨ 魏宏运:《孙中山年谱》,第185、56页。
- ④④②④③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12—117页。
- ④④ 《中央党务月刊》,第八期
- ④⑧ 湖南政协:《湖南文史资料》第二辑,第70—71页。